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瓶颈和政策重点*

刘志彪**

摘要: 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目前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也要克服一些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需要消除部门间资本收益率严重不均衡现象,打破行政垄断、降低进入障碍;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尤其是处于短板状态的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分配体系建设的核心,是要承认人力资本的价值;要正视和改善区域间开放不均衡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域发展体系建设的重点;完善绿色发展体系,要在制度建设上把环境保护成本内部化为财富;加速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对内开放的步伐;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从纵向改革转向横向改革,确立企业和个人的强势市场主体地位。

关键词: 现代化经济体系 发展瓶颈 经济政策 经济改革

DOI:10.16110/j.cnki.issn2095-3151.2019.12.011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关键问题与理论创新问题,尤其是关于建设“四位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刘志彪,2018a,2018b,2018c,2018d)。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迅猛增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如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由此支撑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再如新时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势不可挡,五大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又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成为社会的基本意愿和共识,实现经济体制现代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等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完成这个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纲领所描述的宏伟目标,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克服许多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困难,同时需要弥补一些客观存在的短板。

本文将把注意力转向分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瓶颈和政策重点问题。需要明确说明的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务院参事室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2018~2019年课题“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教授,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是，有些可能遇到的重要瓶颈，从一个视角看是困难和问题，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有利的发展条件。例如，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应该说是建设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的障碍，但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有选择空间和主动作为的优势所在。同理，对内开放不足，也是我们可以扩大内需、进一步挖掘发展潜力的优势所在。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在分析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瓶颈和政策重点时，要采取辩证的思维看待本文提出的具体困难和现实问题。文中提出的问题极其重要，考虑不周全请各位批评指正。

二、产业体系：核心问题是资本收益率差距背后的进出管制

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因此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从要素协同的角度，提出了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和要求，有利于从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它们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便于分析产业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为更好地实施产业政策指明方向。

我国现阶段产业体系发展上的重要弱项，主要是产业部门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这种重大结构性失衡，一是表现为滞存与短缺并存，一方面很多初级原材料和中低端制造业部门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很多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投入品部门又供给短缺甚至主要仰仗进口。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发展不对称，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为后者的服务能力不足。三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之间不对称，房地产发展过度抢占和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营运成本和机会成本。从表面上看，造成两者之间不对称的直接原因，在于各产业部门资本收益率存在巨大的悬殊，由此扭曲了企业按市场信号进行的决策。如从2009~2018年的情况看，房地产、金融业、工业的毛利率差距一直较大，其中，工业的平均毛利率一直维持在12%~15%，房地产业在30%~40%之间，金融业2009~2014年大约在18%~25%，但是从2014年之后，其毛利率得到了迅速的拉升，从2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夸张的60%左右，2017年中期以来开始有所降低，目前也在50%左右。当前很多从事实业的上市公司，其赢利能力也十分微弱甚至亏损。这样资本自然不可能顺畅流入，相反还要斩仓出局；而赢利丰厚的虚拟经济部门自然要素会流入踊跃。结果必然会造成产业部门间的发展严重失衡。

资本收益率为什么在产业部门间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差别？这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时不得不深入追问的问题。在短期内，由于各种需求供给因素的影响，这种收益率的波动和差距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这种收益率差距长期存在，不能趋于均等化，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市场竞争中一定存在着严重的阻碍要素流动的因素，导致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如牌照管制成为金融进入的高障碍；或者存在资本退出产业的壁垒，如很多国有企业云集的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部门，因企业无法在供给过度的市场中正常退出而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缓解产业部门间存在的严重的非均衡状态，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政策的重点就是：一是要打破行政权力通过国有资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行为，取消所有制分类管理，让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平等竞争，从而促进利润率尽快出现平均化趋势，给投资主体正确的市场信号；二是要强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尤其要强化资本的盈利属性，让其既能按照盈利

信号主动进入需求有前景的产业，也能根据市场信号进行投资战线的收缩，实现退出市场的自由选择，以此缓解可能发生的投资失误和产能过剩；三是在进入资产短缺时代后，要特别注重强化资产管理，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概念，扩展到包含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的管理方面，通过加大资产供应，平抑社会对资产的旺盛需求。否则以房地产、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活动，在资产短缺的时代很容易导致价格过高的泡沫经济状态。

三、市场体系：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市场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作为由商品、服务市场及要素市场构成的有机整体，市场体系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有效运转的微观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从对市场的放手、放开和放活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与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建设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命令已大幅度减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起着决定性作用。表现为市场主体数量从不足 50 万户增加到 1 亿户以上，增长了 200 多倍，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已经形成；竞争性领域价格也基本放开，97% 的商品及居民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李伟，2019）。对中国市场体系发育和发展的评价，理论上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商品市场得到了彻底和充分的发展，但是要素市场还受到比较严厉的管制，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对称。二是货币市场发展充分有效，但是资本市场功能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如目前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 6% 左右的股本资金，剩下的 94% 左右都是银行贷款，因此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发展高度不对称。三是与物质类市场的发展相比较，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如户籍制度还严重影响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变量和经济主体的决策，商品服务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发展不对称。

因此目前市场体系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是要素市场。这个市场并没有完全根据市场原则进行充分的竞争、配置和定价，政府还比较严厉地控制或影响着某些关键要素的配置和价格形成。例如，政府通过控制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权和城市土地的分配权，决定土地使用的时机、目的、使用者、使用价格、使用期限和使用范围等一系列问题；再如，城乡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就学、就医等仍然受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的严格限制；又如，政府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则更加突出，除了五大商业银行均为国有外，在商业银行进入、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控制措施。要素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目前中国企业股本融资比例过低，已经直接引起了高速增长中的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潜在的金融危机的威胁。

政府对要素市场的严格的行政控制，扭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内在的根本原因。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当务之急必须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主要的改革重点有：一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市场准入自由化改革。二是逐步放开户籍控制，实现劳动力流动市场化改革，户籍、居住、身份的三证合一。三是破除金融部门行政垄断，推进资金配置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四是减少政府产业政策的运用规模和力度，大幅度削减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直接补贴。五是减少和合并政府各部门主导的各类产业基金，让政府公共资金集中投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六是加快放开土地、资金、房地产、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价格。七是深化企业上市和退市制度改革（杨伟民，2018）。

四、分配体系：核心问题是要承认人力资本的价值

分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成果分享机制和动力机制。与过去快速增长时期相比，过去剩余索取权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掌控，发展动力主要是由物质投资者驱动，而在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发展成果的分享或共享机制，将成为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投身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在从温饱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分配机制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据研究，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000 年就超过警戒线 0.4。2003 年至今，该系数从未低于 0.46，2015~2017 年，由 0.462 升至 0.467。^①

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不利于建设和谐包容的社会，当然也不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所需要的分配结构。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往往有多种综合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但是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不对称，是其中的基础原因。

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不对称，也导致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助推动力严重不足。中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低下。以中美两国为例。中美居民工资性收入占 GDP 的比重其实大致相当，都在 50% 以上。但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仅有 3%，远低于美国 25% 的比重。财产性收入的低下，使得中国居民总收入占 GDP 比重偏低，因而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因而不高（徐高，2017）。

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例一直较低，而且长期处于下降通道，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 年时为 46.9%，到了 2017 年只有 38.4%。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在 60% 上下，如 2016 年美国为 68.8%，日本为 55.7%，加拿大 2017 年为 57.8%，法国 54.1%，德国 53.1%。在高速度发展阶段，我国的内需增长量主要来自投资。由于长期受房地产泡沫、高杠杆以及产能过剩三大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增加房地产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和增加制造业投资等传统的政策工具方面，其潜力已非常有限，因此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尤其是居民的消费，应该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现代化的消费驱动和消费结构，是替代投资驱动成为新内需的主要力量。

因此，将中国从出口大国和投资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中国的消费占比的提升，就有可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的空间。认识到这个原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提升居民消费在整个 GDP 中的比重。分配关系调整就直接是利益关系调整，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议题是调整原有僵化的利益关系，给经济发展以新动能。针对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调整分配关系、扩大内需的政策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此，一是迫切需要在产权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明确不能仅仅是物质资本拥有剩余索取权，而人力资本也要适当参与剩余的分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分享利润的资本所有者与仅拿取工资的劳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二是确立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的政策体系。不仅生产要讲效率，分配也要讲公平，现阶段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具体来说就是不仅再分配要讲公平，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讲公平，尤其要在初次分配阶段形成平等竞争的条件。三是在市场体系建设上，要重点建设资本市场强国，让人们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而不是成为人民财富的“绞肉机”。为此要尽快扭转资本市场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

^① 付一夫 《数据告诉你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有多大?》，<http://finance.jrj.com.cn/2018/07/30154424879307.shtml>。

业解困、圈钱的功能，以为人民为中心、以增加人民的财产收入为中心改革其法治管理和行政管理。

五、区域发展体系：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胡焕庸线”上下左右有所作为

区域发展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空间载体、存在方式和方位。一个既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又符合基本国情的区域发展体系，至少具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土资源效率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要素密集程度较大，投资强度大、土地亩均产出高；三是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进行开发，因而生态容量适度；四是以大和特大城市为核心，形成连绵的城市群落；五是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发展差距较小。

从总体上看，长期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体系都一直具有地理上的“胡焕庸线”的结构特征，即胡焕庸线的左上方与其右下方两端严重不对称。如在人口、GDP等经济指标的对比上，在胡焕庸线的西北侧，贡献了全中国的不到5%的份额，而东南一侧贡献了95%以上。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完成建设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的宏伟目标，都要从这条具有岿然不动的地理特征出发。比如，这就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对外开放要从沿海地区开始，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关系时，一直都是效率型的产业政策主导区域政策，优先把资源按效率原则投入到东南一侧的产业部门，而不是公平性的地区政策主导产业政策，优先把资源按公平原则投入到西北侧的产业部门？同样，据此也不难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等对中西部开放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价值。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体系的建设目标，能不能改变“胡焕庸线”的结构特征呢？根据过往历史经验判断，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但是进入新时代，为了加快实现基本现代化，要求我们在“胡焕庸线”的上下左右有所指作为，以达到区域发展体系的上述五个现代化特征。为此一方面，要让相对发达的东南侧，全面进入压缩时空、提高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塑阶段，进一步挖掘提高国土资源效率的空间，建设连绵世界级城市群。其实到目前为止，即使是中国东部最发达的地区，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二元结构，如山东沿海与鲁西北地区，江苏苏南与苏北地区，浙江杭嘉湖平原与浙西南地区，珠三角地区与粤西北地区等，发展的差距也是非常悬殊，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在交通技术的支持下，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推动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采用积极有效的措施协调日益扩大的东中西发展差距。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广阔、连绵的西海岸，中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自然受制于地理位置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长江经济带开发力度这篇大文章，把胡焕庸线以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发展起来，就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不是用东中西联动的战略来发展中西部，而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投资砸钱来发展中西部，这是高投入低产出，是没有效率的折腾。因此与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鼓励沿海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制造业沿长江流域转移，而不是鼓励向外转移，就是建设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的重要抉择。

在“胡焕庸线”的上下左右有所指作为，总体上是指要在区域协调发展有所作为。围绕“胡焕庸线”，中国未来至少需要具体要解决两个不对称问题：一是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均衡；二是长江以北与长江以南的不均衡。第一个不均衡是开放不均衡带来的，因而解决的办法是职能是加速开放，尤其是要把向东开放与沿着“一带一路”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全方位立体开放。第二个不均衡现象近些年来比较显著，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现在长江以北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中国北方除北京

外,绝大多数地区呈现出加速“铁锈化”的趋势,而且十分严重。这一重要现象无论是从 GDP 总量、财税收入、用电量、人口流动、资金流向,还是从科技创新、注册企业数量、高铁线路、产业结构形态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指标进行追踪,都可以发现非常明显的痕迹。现在北方广大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往往把人口与资源输送到南方,把经济负担和社会矛盾留在了本地。南北方发展差距的拉大,或者北方经济的沉沦,是不是一个长期趋势,这个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重心的设定等因素看,经济发展南强北弱一直是一个地域特征。但是数据显示,中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发展差距拉大,以及某些地区加速“铁锈化”的趋势,是 2012 年以后出现的问题。具体原因还需要深入全面分析,但是有几点是无疑的,如偏重重化工业的产业形态,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政策一直把某些省份定位为重化能源基地。再如所有制结构调整缓慢,国企一统天下格局没有打破,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差,等等。至于应对北方经济铁锈化趋势的对策建议,自然应该针对引起问题的原因来设计。如应在提高开放度中促进北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优势,促进北方营商环境优化;引进南方民营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开放,等等。

六、绿色发展体系:核心问题是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为财富

绿色发展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态环境基础。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标准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能够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多次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过去的工业化中,我国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高环境成本的道路。一是很多决策者认为在贫困和温饱发展阶段,环境破坏是必须先付的代价,要金山银山就不能要绿水青山,民间也有“宁可毒死、不要饿死”的说法;二是干部考核和晋升制度变相支持追求 GDP 增长速度,追求财政收入扩大,诱导政府官员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那些价高税大的工业污染项目;三是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机制不健全。如没有建立各种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另外,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进程滞后,而且往往“按高要求立法,普遍存在违法,选择性执法”等不良现象。

在上述发展环境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理念是冲突的,后果和教训也是十分惨痛的。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形势的严峻性为例,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这样痛心地描述了长江流域触目惊心的生态污染“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 30% 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 43%、37%、43%。……长江经济带内 30% 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源地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生产储运区交替分布。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 1.7 亿吨、超过 250 种,运输量仍以年均近 10% 的速度增长。”

概括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均衡,主要有两个:一是物质导向的财富观与美好生活导向的财富观的冲突,前者认为生态环境是投入,是成本而不是国民财富。这会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资支出产生内在的抵制,从而恶化已经糟糕的环境。二是制度创新供给不足条件下,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的冲突,即经济主体既不承担损害环境的社会成本,也不享受保护环境投资

支出的收益。这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或外部经济不能内部化的表现。即使认识到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环保制度的创新，也无法克服市场经济下固有的环保外部性问题。建设现代化绿色生态环境体系，在环保的制度供给方面，主要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经济评价和干部业绩考核制度。传统的经济评价体系，不仅是割裂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更是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摆到了对立和冲突的地位，致使经常出现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因此，构建反映绿色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就是要摆脱单一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构建“国民生态产值”概念，把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纳入每年增加的国民财富流量当中；把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效应，作为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的扣除项。以这种思路统计、评价、考核干部业绩，并作为晋升的主要依据之一，自然会产生保护环境的内在动力。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操作制度。要把环保工作的倒逼机制，尽快提升到政策层面，并把其可操作化。如现在可以探索推行实施两类交易制度：（1）以单位 GDP 能耗为基础的节能交易制度。在这样一种节能交易平台上，单位 GDP 能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可以卖出相应的节能量；而单位 GDP 能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则必须买进相应的额度。显然实行这一交易制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区能耗量的下降。（2）以水环境质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具体是对水质达到一类水标准的地区，达到程度越高、比例越高则奖励越多，而对三四类水质比例高的地区，实施惩罚性倒扣。这种制度安排适用于具有上下游关系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刘志彪，2017）。

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保的法治体系。要把那些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符合规律和趋势的治理生态环境的经验，上升到法律形态固定下来，以更好地调节经济与生态、人和自然的关系。要把绿色发展的制度纳入法治之中，在防污治污、绿色循环、补偿、税收等方面加快法治建设。

七、对外开放体系：核心问题是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能量交换和补偿机制。开放才能吸收和交换内外的发展要素和增长能量，才能实现内外的统一竞争，才能在竞争中定位好自己的产业分工角色，才能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越开放，发展水平越高，增长越持续、越平稳；中国经济不怕开放和竞争，怕的是封闭和闭关自守。建设现代化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就是要建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与全球经济有着高水平双向循环的经济，既可以引进来，也可以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也可以吸收商品和要素；不仅要向东开放，而且沿“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总之，要实现高水平立体的双向开放格局。

纵观过去中国开放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存在的几个严重的不对称问题：一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不对称；二是出口导向与内需导向之间不对称；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对称；四是商品市场开放与要素市场开放不对称；五是向东开放与向西南方向开放不对称。所有这些开放的不对称，核心问题是对内开放不足，对企业和个人尤其对民营企业限制较多。习近平同志总结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地方和部门政府的政策针对民营企业的“卷帘门”“玻璃门”“弹簧门”等，以及针对个人选择的户籍、学籍等限制，等等，都是对内开放不足的主要表现。对内开放不足，影响对外开放的步伐和水平，如造

就了国内市场外资与本土企业直接严重的不平等竞争态势，抑制了民营企业发展。这将影响民营企业走出去、走上去的能力；限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从而抑制了利用内需持续虹吸外国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技术和可能性；压制了要素市场的发育成熟，以及要素市场深度开放的可能性。

对内开放不足说到底是对内改革不足、改革滞后于开放和发展的状况造成的。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加快国内开放，尤其是有加快对民营企业 and 个人的开放，不断塑造强市场主体，让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力，独立自主承担更多的决策责任，分享更多的利益。

八、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是转向横向改革

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和保障的决定性基础条件。中国经济不缺人，也不缺技术，缺的是好的机制。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不对称，政府过于强势，而市场力量微弱和萎靡。最近我针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专门的文章，这里不再赘述（刘志彪，2018e）。仅指出一点，从纵向改革为主转向横向改革为主，是形成政府与市场“双强”体制机制的关键。转向横向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充分相信市场主体、企业家、社会成员、民间机构、家庭和个人的自组织能力，以及它们作为主体性对政府在中作用中的替代。说到底，是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自我管理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李伟 《改革开放 40 年，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19 年 1 月 8 日。
- [2] 刘志彪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关键问题与理论创新》，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a。
- [3] 刘志彪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b。
- [4] 刘志彪 《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载于《学术月刊》2018 年第 7 期，c。
- [5] 刘志彪 《建设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d。
- [6] 刘志彪 《造就边界清晰的“双强体制”》，载于《经济参考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e。
- [7] 刘志彪 《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载于《学习与探索》2017 年第 2 期。
- [8] 习近平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于《当代党员》2018 年第 13 期。
- [9] 徐高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国经济》，载于《新金融》2017 年第 5 期。
- [10] 杨伟民 《解读十九大报告经济体制改革》，载于《现代国企研究》2018 年第 Z1 期。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19 年第 2 期